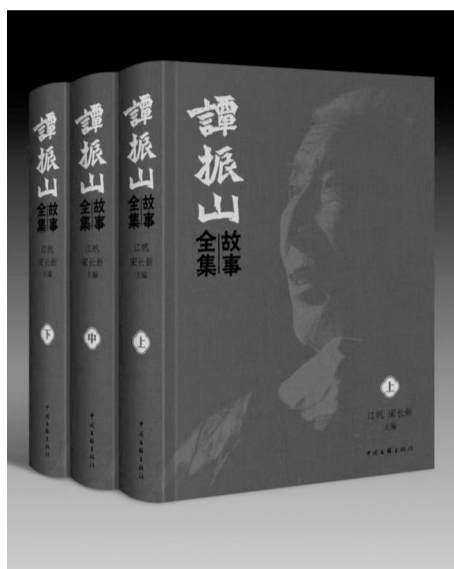


## 从“一枝独秀”到“满园春色”——

## 辽宁非遗做对了什么？

3月底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公布了全国20件获奖作品，其中，辽宁独占两席：江帆、宋长新编纂的《谭振山故事全集》摘得优秀民间文学作品奖，唐帅创作的岫玉“水生世界”系列作品荣获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颁奖典礼举办一周后，江帆、唐帅入选2025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候选人。更值得关注的是，辽宁共有5件作品入围本届山花奖全部4个子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从“一枝独秀”到“满园春色”，辽宁非遗做对了什么？

江帆、宋长新编纂的《谭振山故事全集》。谭振山在自家屋后讲故事。



▲江帆、宋长新编纂的《谭振山故事全集》。  
▶谭振山在自家屋后讲故事。



唐帅带着作品参加非遗活动。

## “买金子的遇到了卖金子的”

1987年，在辽宁新民一场“故事擂台赛”上，35岁的江帆第一次见到农民谭振山。老人讲故事时，语言质朴，眼神发亮，辽河平原的风物人情在他的口中“活”了起来。江帆后来形容这次相遇是“买金子的遇到了卖金子的”。

此后24年，江帆无数次往返于大学与乡村之间，记录下谭振山能讲述的1062则民间故事。2006年，“谭振山民间故事”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528个项目中唯一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项目。

作为辽宁大学资深教授，江帆的田野调查方法被称为“田野诗学”——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还是山”，形成“物—事—人—整体背景—精神世界”的闭环。他不仅记录故事，更关注讲述者人生经历、情感变化对叙事的影响：谭振山年轻时多讲道德训诫故事，晚年则关注养老问题，这种叙事转向让他记录下辽河地域“曾经非常真实的生活”。

2011年，谭振山去世。江帆继续整理研究。2024年底，《谭振山故事全集》出版，共3册、190余万字，收录近千则民间故事，辅以年谱、自传、方言注释等6类附录，完整呈现口头文学的活态传承。专家评价其“从乡野深处打捞千余则故事，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起文化的链接”。

“民间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代代人的‘心事’。真正的中国表达，不仅在宏大叙事里，更在每一个村庄的方言和流行的故事中。”江帆说。

## 把不值钱的石头做成艺术品

唐帅的故事关乎“读懂玉”。1993年，中学毕业的他被父亲送去学厨师。父亲是机械工程师，认为儿子“没有美术天赋，干不了玉雕”。但唐帅在厨师班学会了色彩构成、刀工雕刻。两年后，他瞒着父亲转行做玉雕。彼时在岫岩，玉雕师一个月能挣6000元。

起初父子俩“一个劲儿吵架”，但正是这种“鞭策打压”，逼出了唐帅的独特眼光。当

所有人都在加工河磨老玉时，他发现被当成配料的花玉虽然色彩斑斓却无人问津。于是，他把花玉从底座材料变成创作主体，一做就是24个系列，硬是把“不值钱”的石头做成了艺术品。唐帅说：“我是把当厨师学到的雕刻技艺用到玉雕里。”他的作品题材极其生活化：辣椒、萝卜、桃子、葫芦，从不雕藤蔓，只雕一个果实，主题突出。

2016年，他随文化部交流团赴法国学习了7天珠宝设计。回国后，他走遍三山五岳、四大石窟，用西方视角重新审视东方美学。他为岫岩冰料量身打造的“水生世界”系列就是从唐代吴道子“吴带当风”中汲取灵感，在坚硬玉石上雕琢出富有韵律的轻柔线条，将东方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唐帅的岫玉雕刻项目成为总规模10亿元的山花产业发展基金首个拟投资项目。“岫岩玉雕行业发展，一定是艺术带动商业。”唐帅说。

## 根植泥土 但不拒绝飞翔

江帆和唐帅的获奖固然耀眼，但辽宁此次的整体亮相更值得关注：耿柳编著的《子弟书史论》入围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终评；抚顺地秧歌民间艺术团表演的《山花闹》、大连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表演的《喊海》双双入围优秀民间艺术表演终评。5件作品覆盖山花奖全部4个子项目，这是辽宁系统化推进非遗保护的可喜成果。

深耕田野，是辽宁的“根”。从20世纪80年代参与“中国文学三套集成”编纂，到2005年后非遗保护全面铺开，辽宁学者始终坚持“向下扎根”。江帆对谭振山24年的追踪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方法论。正是这种“慢功夫”，让辽宁拥有了全国较为完整的满族民间

故事数据库。

跨界融合，是辽宁的“翼”。唐帅从厨师到玉雕大师的转型，折射了辽宁非遗“开门保护”的理念。传承人不再固守师徒旧模式，而是鼓励与设计、营销、旅游等现代产业跨界合作。唐帅的玉雕艺术馆建在村里，却面向全国，徒弟来自各大美院。“在地而不封闭”的姿态，让传统手艺获得新生命力。

整体推进，是辽宁的“势”。5件作品入围全部子项目，证明了辽宁民间文艺的“生态多样性”，既有学术深耕的《子弟书史论》，也有原生态表演《喊海》；既有个人创作的玉雕精品，也有团体呈现的地秧歌。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相关负责人说：“非遗保护不能只靠少数‘明星传承人’，而要构建从田野调查、学术研究到创作实践、活态传承的完整链条。”

文化的生命力，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在乡间的方言里，在匠人的刀锋下，在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讲出的“心事”中。当190余万字的乡野史诗、灵动飘逸的玉中水母、激昂豪迈的渔家号子与欢腾热烈的满乡秧歌在同一座国家级舞台上交相辉映，辽宁非遗正在告诉世界：真正的民间文艺，永远根植于泥土，却从不拒绝飞翔。

中国文化报



▶唐帅带着作品参加非遗活动。



香港中文大学实验考古木质轴与石质轴承结合轴机械。

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不仅在文明进程中“先走一步”，在工具与技术的创造上同样展现出非凡的智慧。近日，记者专访了深耕辽宁考古40余年的辽宁大学教授张星德，围绕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工具发明展开对话。

记者：您在辽宁地区参与和见证了多项重大考古发现。除了文明形态的“先行”，辽宁先民在工具与技术方面是否有独特的创造？

张星德：是的。辽宁地区的史前文化，尤其在以查海遗址为代表的时期，出现了不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具发明。其中，石轴承的发现非常关键。

查海遗址出土的石轴承，是用石块打制而成的。它的出现，将中国史前轮轴机械的起源明确追溯到距今约8000年前。这不仅是辽宁先民的智慧结晶，也具有重大的科技史意义。

记者：石轴承具体是如何被证实并使用的？

张星德：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曾进行过实验考古。他用天然河卵石模拟查海石轴承，搭配木质轮盘、竹管钻具和石英砂解玉砂，成功对软玉毛坯实现了管钻。这个实验打破了“史前无法完成软玉大型管钻”的传统认识，证明查海先民已经掌握了借助机械辅助进行玉石加工的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查海出土的石轴承形态已相当成熟，并非最原始形态。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熟练掌握轮轴机械的设计与制作技巧。结合遗址中出土的44件玉器，可以推测当时可能已出现一定规模的玉石专业化生产，手工业分工初步显现。

记者：除了石轴承，同一时期还有哪些工具方面的创造？

张星德：工具创造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在查海遗址还发现了大量打制的凿形器与铲形器，器身对称打孔或束腰，便于捆绑木柄。辽宁大学的青年学者王闯曾复制这类石器进行实验，发现通过不同的捆绑方式，它们既可用于挖土、锄地，也能作为斧头工具劈砍，一器多用，实用性强。这类器形在同期其他地区文化中较少见到。

此外，通过植物考古，我们在查海发现了处于野生向栽培过渡阶段的黍、粟颗粒，说明这里不仅是农业起源地之一，与之配套的农具也应应运而生。而更早阶段，如小孤山遗址，已出现使用岫玉制作的玉质工具，葫芦岛杨家洼遗址也发现了早于查海的玉斧、玉球等，虽然相关研究尚待深入，但已显示出本地治玉工艺的悠久渊源。

记者：这些工具创造，反映了先民怎样的生存智慧？

张星德：辽宁西部属于过渡地带，土壤不厚，不适合大规模单一农耕。先民为了在此长久生存，发展出了农耕、渔猎并重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生存方式要求工具必须适应性强、一专多能。无论是可捆绑多种手柄的石器，还是用于提高玉器加工效率的石轴承，都体现出一种务实、灵活的创新思维——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围绕着具体的生存和生产需求展开。

石轴承的意义尤其深远。它表明，早在8000年前，这里的先民已不满足于单纯的手工操作，开始探索利用机械原理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技术意识，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力。

记者：对于这些工具遗产，我们今天应如何理解与传承？

张星德：我常感慨，先民的智慧往往藏在这些看似朴实的石头与骨骼里。石轴承不仅是一件文物，它更是一个时代技术思维的物证。它告诉我们，文明的前行，既离不开宏伟的仪式与社会组织，也离不开这些日常而关键的技术突破。

我想，对今天的启示在于，我们应当更细致地走进古人的技术世界，理解他们如何利用有限条件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因地制宜、勇于创造的精神，是辽河流域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的一个生动侧面。

辽宁日报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 参加工伤保险 保障职工权益

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

